

敦煌丝绸艺术全集

TEXTILES FROM DUNHUANG IN UK COLLECTIONS

主编 赵丰

英藏卷



东华大学出版社

东 华 大 学
大 英 博 物 馆
维多利亞阿伯特博物馆
英 国 国 家 图 书 馆
中 国 丝 绸 博 物 馆



英藏卷

敦煌艺术全集

王其成



主 编	赵 丰
副 主 编	汪海岚
	白海伦
	吴芳思
助理主编	王 乐
	徐 铮

东华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敦煌丝绸艺术全集·英藏卷 / 赵丰主编. — 上海: 东华大学出版社, 2007.3
ISBN 978-7-81111-196-5

I. 敦… II. 赵… III. ①西域—丝织物—收藏—世界②西域—丝织物—收藏—英国 IV. G8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21675号

敦煌丝绸艺术全集 英藏卷

主 编 赵 丰 Zhao Feng

副 主 编 Helen Wang 汪海岚 Helen Persson 白海伦 Frances Wood 吴芳思
助理主编 王 乐 徐 铮

论文作者 汪海岚 白海伦 吴芳思 赵 丰 王 乐 徐 铮 包铭新 沈 雁
图录说明 赵 丰 徐 铮 王 乐 (大英博物馆和英国国家图书馆部分)
白海伦 (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部分, 蒙印度政府慨允)

翻 译 邝杨华
译 校 汪海岚

摄 影 Kevin Lovelock (大英博物馆部分)
Colin Maitland Ian Thomas (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部分)
Rachel Roberts (英国国家图书馆部分)
赵 丰 王 乐 徐 铮 (织物结构部分)

封面题字 冯其庸

出 版 人 孙福良
策 划 李柯玲
责任编辑 马文娟
设 计 彭 波 薛小博

出 版 东华大学出版社
上海延安西路1882号 电话: 021-62193056 邮 编: 200051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排 版 上海东雅设计公司
杭州方也印前工作室
印 刷 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x1194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766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1111-196-5/J·050
定 价 498.00 元

所有图片版权除注明外分别属于各收藏机构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和英国国家图书馆。
文字版权属于作者。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录

第一部分 论文

第二部分 图录

赵丰 白海伦 徐铮 王乐

第三部分 总表

徐铮 王乐

第四部分 附录

总序 徐明稚

英藏卷序 尼尔·麦克奎格尔 马克·琼斯 林恩·布莱得利

致谢

伦敦收藏的敦煌丝绸	汪海岚 白海伦 吴芳思	12
敦煌丝绸的类型与分期	赵丰 王乐 徐铮	22
敦煌文书中记载的织物使用情况	包铭新 沈雁	28

1. 伞盖	38
2. 幡	58
3. 帙、巾	90
4. 多彩织物	116
5. 单色织物	156
6. 夹纈	188
7. 刺绣	212

大英博物馆藏	徐铮 王乐	230
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藏	徐铮 王淑娟	263
英国国家图书馆藏	徐铮 于颖	306

1. 敦煌编号说明及编号对照表	汪海岚 王乐	326
2. 专有名词中英文对照表	卞杨华	337
3. 参考文献	汪海岚 卞杨华	339
4. 伦敦的敦煌织物展示		345
5. 索引		346
6. 图片来源		348

总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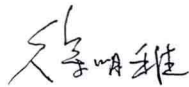
丝绸之路是人类历史上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它以丝绸为载体，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是世界文化珍贵的遗产。1900年，道士王圆箓意外发现“藏经洞”，其中除大量文书和佛画之外，就是各种各样的以丝绸为主的纺织品。藏经洞发现后，英国斯坦因、法国伯希和、俄国鄂登堡以及日本大谷探险队等纷纷来到敦煌，用各种手段取得大量藏经洞发现的文物，其中包括十分珍贵的丝绸。这种状况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得到了彻底的改变，在敦煌研究院的主持下，莫高窟得到了科学的保护，在清理和发掘的过程中，又发现了几批自北魏至元代的丝织品。

现存的敦煌出土丝织品主要收藏于中国、英国、印度、法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众多研究和收藏机构。对于国外收藏的敦煌丝织品，总体只有零星刊布，罕见专门著作。基于藏经洞发现而形成的敦煌学虽然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其中的丝织品却一直缺少系统的整理和深入的研究，因此，东华大学组织了《敦煌丝绸艺术全集》这一工程，并已列入“十一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

敦煌莫高窟发现的织物以丝绸为主，同时也包括少量其他纺织品。不过，本书对纺织品的界定是采用织、染、绣工艺完成的文物，以及部分以装饰效果为主的彩绘文物，而不包括以佛教造像为题材的绢画和布幡。

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东华大学的前身中国纺织大学就开展了中国纺织科技史的全面研究。2000年，我校又与敦煌研究院合作成立了敦煌服饰研究中心，对敦煌服饰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现在，我们又开始与英国、法国、印度、俄罗斯等国以及国内的学术机构合作，收集和整理散藏于世界各地敦煌出土的丝绸和纺织品，从纺织科技与艺术的角度进行分析、详细记录、整理出版，这将填补敦煌学在丝绸研究方面的空白，也将为丝绸之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纺织服饰美术史研究等领域添写新的篇章。

我们衷心地感谢所有的合作伙伴慷慨地提供他们所收藏的敦煌纺织品资料，提供各种便利的条件使得我们的合作顺利展开。我们也期待敦煌学研究能通过这一全集的出版得到进一步的深入发展，中华灿烂的历史和文化将继续通过新丝绸之路与整个世界交相辉映。



东华大学校长

英藏卷序

许多世纪以来，敦煌一直是丝绸之路中国西部的一个重镇。由东往西的旅行者在穿过塔里木盆地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之前要在此做最后的休整，而由西往东者在经过了漫长的旅途之后也会在敦煌寻找暂栖之处，其中有许多人会前往敦煌东南的千佛洞朝拜。就在此地，数以千计的经卷、绘画、织物以及其他文物在11世纪初被封存于一个小小的石室，即举世闻名的第17窟。20世纪初，道士王圆箓翻修佛窟，机缘巧合地发现了藏经洞。后来，他即拿出藏经洞的部分文物换取资金，来翻修寺庙，改善朝拜者的住宿条件。

1907年5月，即藏经洞与世隔绝约九百年后，奥雷尔·斯坦因首次访问敦煌。他从王圆箓那里得到了大量遗书和织物，并把它们运到伦敦让专家进行研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将这些文物在伦敦保存、记录，其相关资料也得以出版问世。他的科学报告《西域考古图记》汇合了当时一些顶尖学者的成果，为中亚和东亚早期的历史和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藏经洞的文物无疑改变了东方文明研究的许多领域。遗书有助于了解古人的语言和文字，绢画和佛窟内的壁画揭示了公元4世纪以来的佛教艺术传统，同样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织物，显示了它们同时受到东西方两种传统的影响。不过，虽然人们对织物也颇感兴趣，但当时最为吸引人们视线的还是敦煌的遗书和绘画。

因此，在2006年夏天，我们高兴地欢迎来自上海东华大学和中国丝绸博物馆的赵丰教授以及他的助手王乐和徐铮，研究分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和英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织物。该项目同时也是他们和英伦三馆工作人员之间一次极为成功的合作。

2007年5月，距藏经洞与世隔绝约有千年，距斯坦因首次访问敦煌恰逢百年，我们很高兴在这一时候看到本书的出版，它是中英两国学者共同合作的结晶。我们坚信，敦煌学的明天将建立在进一步的国际合作上。

Neil MacGregor
尼尔·麦克奎格尔
大英博物馆馆长

Mark Jones
马克·琼斯
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馆长

Lynne Brindley
林恩·布莱得利
英国国家图书馆馆长

致 谢

2006年是我们研究敦煌纺织品的一个重要年份，至少有三件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首先是大英博物馆得到了英国学术院的资助，邀请我前往伦敦进行斯坦因藏品中纺织品的整理和研究，并为其完成美林数据库中的相关资料，结果我于该年的4月18日至9月20日在伦敦度过了5个月的时光，完成了对大英博物馆收藏所有斯坦因纺织品的分析和整理，共五百多件，其中包括220件来自敦煌藏经洞的织物。二是由东华大学出版社承担的中国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多卷本《敦煌丝绸艺术全集》开始启动，其中首先启动的是《英藏卷》，东华大学和中国丝绸博物馆为我提供了两名助手王乐和徐铮，她们于6月15日至8月12日来到伦敦，和我一起在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和英国国家图书馆工作，完成了对三馆所藏所有敦煌纺织品的分析和研究。三是由东华大学、敦煌研究院和中国丝绸博物馆联合申报了200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敦煌丝绸与丝绸之路——历史、科技、艺术的综合研究》，我们同时展开了对敦煌丝绸与丝绸之路更深层次的研究工作。这三项工作相互关联，同时进行，但现在首先可以看到的是《敦煌丝绸艺术全集》中的《英藏卷》将要面世。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们首先要感谢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蒙印度政府慨允）和英国国家图书馆慷慨地提供各种方便，让我们进行详细的分析和研究，感谢三馆无偿提供了所有斯坦因敦煌纺织品的图片和版权。在这其中我们特别要感谢的是大英博物馆的麦嘉乐（Carol Michaelson），她在主持大英博物馆斯坦因藏品数字化项目的过程中，为了使其中的纺织品内容更为准确和完整，特别邀请我前往英国进行研究，使得这一敦煌项目得以启动。她的组织和协调，使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和英国国家图书馆的同行联合参与这一项目，虽然她在本书中并不承担任何写作任务，但她所起到的作用至关重要。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的东亚部主任马可乐（Beth McKillop）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同时，我们要感谢上海东华大学和杭州的中国丝绸博物馆，他们在经费和人员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东华大学徐明稚校长、研究生部张家钰主任、服装与设计学院李柯玲院长和包铭新教授在组织和协调这一项目的立项和操作，特别是在资金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同时，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俞志达馆长和徐德明副馆长也对这一项目表示由衷的理解，并在人力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感谢直接参与本书写作与相关工作队伍中的所有人员。大英博物馆的汪海岚（Helen Wang）、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的白海伦（Helen Persson）和英国国家图书馆的吴芳思（Frances Wood）三位女士，她们不仅组织和协调了各馆的工作，并在本书中撰写了论文及图录说明。东华大学的王乐和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徐铮自始至终参与了整个项目，并撰写了本书中的论文和图录说明，东华大学的包铭新和沈雁也为本书贡献了一篇极有价值的论文。所有这些，都在本书中有详细的署名。除他们之外，这里必须说明的还有：

英文翻译：邝杨华

英文翻译校对：汪海岚

摄影：Kevin Lovelock（大英博物馆部分）、Colin Maitland、Ian Thomas（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部分）、Rachel Roberts（英国国家图书馆部分）、赵丰、王乐、徐铮（织物结构部分）；

绘图：王乐、万芳、冯荟、刘珂艳、顾春华、谭文佳等；

织物组织分析：徐铮、王乐为主，王淑娟、于颖也有部分贡献。

大英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的Monique Pullan及她的同事、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的Lynda Hillyer和Thordis Baldursdottir、英国国家图书馆的Mark Barnard以及她们的同伴为敦煌织物的保护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得这些织物能较为平整地展示在我们面前。大英博物馆的助理们（Museum Assistants）的辛苦操劳和帮助也为我们观摩和研究敦煌纺织品提供了便利条件。

在此我们也要感谢本书的出版人员，东华大学出版社孙福良社长对本书出版给予了各方面的支持。马文娟自始至终负责本书的编辑，彭波为本书进行了精心的艺术指导，薛小博、施红阳、刘文豪等进行了大量具体的排版工作。

我们还要感谢在整个工作过程中给予各种帮助、在写作过程中给予各种指导并提供相关资料的老师和同仁，他们是樊锦诗、郝春文、柴剑虹、孟凡人、荣新江、尚刚、巫新华、扬之水、张涌泉、郭物、府宪展、韦陀（Roderick Whitfield）、大英博物馆方面的Robert Knox、Tanya Szrajber、Cecilia Braghin、Teresa Francis、Louise Fletcher、Mary Ginsberg、Jessica Harrison-Hall、Maureen Theobald、邱锦仙、英国国家图书馆的魏泓（Susan Whitfield）、蒙安泰（Alastair Morrison）、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的卫怡真（Verity Wilson）、张宏星、刘明倩、张越翔、张菁等。

最后我们还要感谢东华大学校长徐明稚教授为本书撰写总序，大英博物馆馆长尼尔·麦克奎格尔（Neil MacGregor）、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馆长马克·琼斯（Mark Jones）以及英国国家图书馆馆长林恩·布莱得利（Lynne Brindley）为本卷作序。冯其庸先生为本书题签。

赵 丰

论文

敦煌丝绸艺术全集
第一部分





图1 斯坦因所拍摄的藏经洞洞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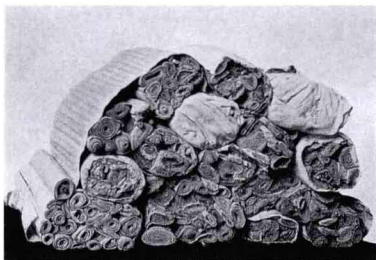


图2 出自藏经洞的写经包袱

伦敦收藏的敦煌丝绸

汪海岚 (Helen Wang) 白海伦 (Helen Persson) 吴芳思 (Frances Wood)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只能抓住有限的东西，然而对中国纺织艺术整体性的研究将把我们引入一个无限的领域^①。

引言

1907年与1914年，奥雷尔·斯坦因 (1862–1943) 爵士曾两次到过敦煌。在千佛洞，道士王圆箓向他透露了第17窟藏经洞的秘密，该洞洞口于11世纪早期被封。藏经洞中的珍宝现已众所周知，特别是那些用各种文字记录的文书和手稿，还有精美绝伦的绢画^②。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织物的重视相对较少，所以，当2006年夏天我们在伦敦欢迎前来专门研究敦煌丝绸珍品的赵丰教授和他的助手王乐和徐铮时，确实非常高兴。

我们的介绍旨在为现藏于伦敦的这批敦煌织绣珍品提供背景性知识。首先是收藏这批丝织品的三家机构的历史概况：大英博物馆 (British Museum)、英国国家图书馆 (British Library) 包括印度事务部图书馆 (India Office Library) 和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其次，我们将对斯坦因收藏品给出一个时间轮廓，斯坦因共有四次中亚探险，其中第二次和第三次到过敦煌^③。虽然伦敦收藏的敦煌织物都来自斯坦因的第二次探险，但为了清楚起见，我们还是准备对这些收藏机构和斯坦因前三次探险所得织物进行简单回顾。第三，我们将对斯坦因整理和刊布敦煌织物以后这三个研究机构所做的相关工作作一概述。

一、大英博物馆、英国国家图书馆、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和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

1. 大英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的藏品最初来自汉斯·斯隆爵士 (Sir Hans Sloane, 1660–1753) 的大量收藏。斯隆去世后，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 (即1753年大英博物馆法)。允许政府购买他多达80,000件的私人收藏品。同时选出一个董事会负责保管这批藏品，并让公众观摩。其他一些重要的收藏包括罗伯特·布鲁斯·科顿爵士 (Sir Robert Bruce Cotton) 家族图书馆的收藏也被同时加入到斯隆收藏品中。博物馆开始向公众开放，图书馆内还为学者们提供了阅览室。其后两百多年间，这个藏有手稿和印刷书籍的图书馆一直是大英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还有一个东方手稿的分部)。

1972年议会通过了英国国家图书馆法案，法案规定英国国家图书馆将从1973年7月开始运作，于是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便成了这个新建图书馆的一个

① 见斯坦因1912年12月8日写给安德鲁斯的信 (包德利图书馆Stein MSS40/173)

② 参见大英图书馆国际敦煌项目：
<http://idp.bl.uk>。大英博物馆斯坦因藏品典型标本：
<http://www.thebritishmuseum.net/thesilkroad>

③ 斯坦因被迫中止他的第四次探险，收藏品全部留在中国



图3 大英博物馆



图4 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



图5 英国国家图书馆

组成部分。从此，大英博物馆内不再有文献资料。博物馆藏品中的亚洲文物起初归入文物部，随着藏品的增加，1921年专门设立了东方文物分部。在印刷绘画部内也有东方印刷绘画分部（1912年设立）。1933年这两个分部合并成立了东方文物部。2003年稍作调整并正式更名为亚洲部。

2. 英国国家图书馆

1972年，英国国家图书馆由几个藏书机构合并建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大英博物馆印刷书籍部和手稿部的收藏。由此，斯坦因收藏的手稿资料包括附有丝织带的中文卷轴从大英博物馆转入英国国家图书馆。1982年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和档案部也并入英国国家图书馆，所以斯坦因从敦煌收集的藏文和于阗文献也和中文文献归在一起。这一新部门最初名为东方和印度藏品部，但最近又更名为亚洲太平洋地区和非洲藏品部。由此可见，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的斯坦因藏品曾几经易手。自1982年起，英国国家图书馆的东方和印度藏品部曾三度迁址：1982-1990年间在 Store Street, London WC1；1991-1998年间在 Orbit House, Blackfriars, London SE1；1998年至今在 St Pancras, Euston Road, London NW1。

3. 印度事务部

印度事务部 (India Office) 的前身是1600年建立的东印度公司 (East India Company)。1858年印度兵变后，东印度公司被英国女王（女王陛下的政府）接管，更名为印度事务部。印度事务部的职能类似外交和殖民地事务部，主要为印度政府处理一些英国境内的印度事务。1947年印度独立后，印度事务部归入外交和殖民地事务部。1982年，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及其手稿和档案文件一起归入英国国家图书馆。

4. 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

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缘起1851年的世界博览会（俗称水晶宫博览会）。博览会的收益用来建立产业博物馆 (Museum of Manufactures)，并购买部分展品，为新博物馆奠定藏品基础。建立博物馆的目的是让大众有机会欣赏到艺术作品，让劳动者受到教育，并让英国的设计师和制造者汲取灵感。1857年博物馆迁到现址并更名为南肯辛顿博物馆 (South Kensington Museum)，从此，其藏品（包括纺织品）迅速增加，并应需要建成了半永久性的展厅。1880年，另一家印度博物馆 (India Museum) 的所有财产正式并入南肯辛顿博物馆。1899年，该博物馆的主厅和主入口动工，维多利亚女王为此奠基，博物馆由此又更名为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

二、斯坦因藏品概况

经过在维也纳、莱比锡 (Leipzig) 和蒂宾根 (Tübingen, 1879-1884) 等地对梵语、古波斯语、印度学和文献学的系统学习, 并在布达佩斯服役期间从事过绘制地图的工作, 奥里尔·斯坦因在印度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他先后担任的正式职位有旁遮普大学 (Punjab University) 的注册主任、拉合尔亚洲学院 (Oriental College, Lahore) 的校长 (1888-1899) 和加尔各答伊斯兰学校 (Calcutta Madrasah) 校长 (1899-1900)。但他真正的兴趣还是在于对中亚、中国、印度、伊朗、伊拉克和约旦的“考古探险”^④。

斯坦因的中亚探险得到了多家机构的资助, 斯坦因也答应为这些机构收集考古和文献实物, 其收集品最后将由各机构按其投资比例分配。斯坦因的第一次探险 (1900-1901) 是由印度政府、旁遮普和孟加拉政府共同赞助的^⑤, 他们同意斯坦因将收集品先在伦敦进行研究后再送往指定的博物馆。斯坦因的敦煌之行发生在第二次 (1906-1908) 和第三次探险 (1913-1916)。第二次探险的资金由印度政府赞助60%和大英博物馆提供40%, 所以, 这次的收集品也按此比例分配。第三次探险则完全由印度政府资助, 结果此次探险的收集品主要都进了新德里 (New Delhi) 一家新建的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只是收藏了一些代表性的标本和“文学遗稿”^⑥。

然而, 在任何一次分配之前, 斯坦因都会尽力把这些藏品放在一起进行研究、编目、拍照并出版。这通常需要很多年, 也会有来自各个机构的代表介入。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缘故, 某些决定又被延误了^⑦。

斯坦因的目的是尽快出版关于每次探险的“个人亲历记”, 以其日记为基础并整理出版, 如《沙埋和田废墟记》(1903) 和《契丹沙漠废墟》(1912)^⑧。在对其收集品做出进一步的研究和编目之后, 还会出版更为学术的“科学报告”, 其中也会包括不同学科专家的研究成果。它们就是众所周知的《古代和田》(1907)、《西域考古图记》(1921) 和《亚洲腹地》(1928)。这两种类型的出版物都以对这些藏品所作的整理和研究为基础^⑨。大英博物馆从斯坦因的第一次探险起就为他提供了这样的便利场所。他的助手安德鲁斯 (Fred Andrews) 也在伦敦和克什米尔 (Kashmir) 帮助整理三次探险的收集品, 这保证了斯坦因的工作持续稳定地进展。

人们总是推测, 斯坦因三次中亚探险的收集品都被集中在伦敦, 成为大英博物馆馆藏的一部分并在那里开展工作。其实这一说法并不准确, 下面我们会回顾一下这些藏品的历史。重要的是, 尽管斯坦因藏品曾留存在大英博物馆, 但只有在博物馆与印度事务部经过协商分配之后, 它们才真正属于大英博物馆。在大英博物馆正式向印度事务部要求一些样品之前, 斯坦因的收藏还不是大英博物馆馆藏的一部分, 而且得到这些样品还常常要经过一段马拉松式的协商。在斯坦因收集品分配方案正式决定之前, 这些文物仅仅是存放在大英博物馆。偶尔, 斯坦因也向专家出借藏品, 在博物馆外进行研究。他的斯坦因藏品助理会记录借出的文物名称、编号及其去处, 以便于日后收回。

④ Mirsky, 1977; Walker, 1995

⑤ Stein, 1907: p. vi

⑥ Stein, 1928: p. xvi

⑦ 参见 Wood, Frances, 1996; Wood, 2004 和 Wang, Helen (ed), 2002

⑧ 斯坦因并未为他的第三次探险发表“个人陈述”

⑨ 关于对照表, 参见 Diamond and Rogers, 1983; Falconer et al, 2002 和 Wang, Helen (ed), 2002

1. 第一次探险收集品

斯坦因第一次探险(1900-1901)的收集品被运到伦敦时,大英博物馆印度文物组还借出了一间专室供斯坦因研究文物。印度政府随后便建议鲁道夫·霍诺尔(Rudolf Hoernle)博士和大英博物馆代表人应该确定收集品的分配方案^①。

2. 第二次探险收集品

斯坦因第二次探险(1906-1908)的收集品也被运到伦敦。它们最初存放在自然历史博物馆(Natural History Museum, 隶属于大英博物馆)^②,等到布伦敦堡区(Bloomsbury)大英博物馆的斯坦因藏品室(Stein Collection)设施就绪后又搬入新址。但斯坦因对那里的设施并不满意,他甚至提出是否能将藏品继续存放在自然历史博物馆或者印度博物馆(隶属于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③,是否有相应的条件存放这批藏品。但他的要求还是被拒绝了,其主要原因是当时在南肯辛顿的博物馆正在进行重大的改造^④。

1909年8月5日,第二次探险收集品最终还是进入了大英博物馆的斯坦因藏品室。斯坦因藏品室独立于大英博物馆的永久藏品,它有自己的锁和工作人员,其中最重要的是安德鲁斯先生和罗里默小姐(Miss F.M.G. Lorimer)。他们尽管独立为斯坦因藏品工作,但他们也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以及博物馆之外的专家协商和讨论。

藏品编目结束之后,也是《西域考古图记》(1921)准备出版之时,关于收集品分配的谈判开始了。1917年和1919年,分配给大英博物馆的藏品两次正式从斯坦因藏品名下转入大英博物馆(见下文),而分配给印度政府的藏品则于1919年2月12日从大英博物馆迁到驻伦敦的印度事务部,准备日后装船运往印度。

然而,这批藏品似乎并没有马上运往印度,相反,它们被留在了伦敦的印度事务部的仓库(India Store Depot)。安德鲁斯的论文《中国古代提花丝织品》的发表(1920)和斯坦因的著作《西域考古图记》以及《千佛》(均在1921)的出版再次引起人们对斯坦因探险收集品的关注,所以1923年3月这批物品又回到大英博物馆。1923年的夏天再从这里转移到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安德鲁斯在这里“完全地投入了分配给印度政府的第二次探险收集品的检查、分配和包装工作”^⑤。这批收集品在这里重新打包,且大部分箱子于1923年10月送回印度事务部的仓库。第二次探险收集的纺织品似乎正是在此时和其他文物分开了。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向印度政府申请借用这批纺织品,并于1923年12月得到了印度政府的同意。三只箱子(据说还包括绢画)被临时存放在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的防空贮藏室里,1924年9月又移入大英博物馆,推测可能是为了和斯坦因第三次探险的收集品(其中有些是1924年从克什米尔送来的)作对比研究^⑥。

3. 第三次探险收集品

斯坦因第三次探险(1913-1916)的收集品送去了克什米尔的斯林那加(Srinagar)。安德鲁斯和罗里默小姐也随着去了斯林那加,在安德

① 大英博物馆档案中心,斯坦因文件,编号CE32/23/5

② 大英博物馆档案中心,斯坦因文件,编号CE32/231。1881年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南肯辛顿成立,随后便成了大英博物馆自然历史类藏品的收藏地。自然历史博物馆附属于大英博物馆董事会,直到1963年议会通过大英博物馆法案才完全独立

③ 大英博物馆档案中心,斯坦因文件,编号CE32/23/23/2

④ Conforti, 1997:p.45

⑤ 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档案,见1923年2月19日斯坦因致C. H. 密斯的一封信;亦可见A. F. 坎德里克1923年3月14日笔记。1897-1924年,A. F. 坎德里克曾在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担任纺织品部主任

⑥ 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斯坦因档案,备忘录,1923年10月3日

⑮ Walker,1995:p.234

⑯ Stein,1928:p.xv

⑰ Stein,1928:p.xv-xvi

⑱ Stein,1928:p.xvi

⑲ 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斯坦因档案,1925年5月18日斯坦因致A. J. B.韦斯的一封信。韦斯是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1924-1934年纺织品部副主任。参见Stein,1928:p.xix

⑳ 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斯坦因档案,1932年6月14日为印度政府开具的纺织品文物借用收据

㉑ 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斯坦因档案,1933年4月20日印度高级事务办公室致教育董事会的信,以及1933年5月4日签订的租借协议

㉒ 例如:罗里默小姐(或佚名者)所写的贴在织物上的小卡片(包德利图书馆Stein MSS 62/154-160)

㉓ 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斯坦因档案中有织物的样本(Stein MSS 39/17 和39/23)并附评注,见1910年3月16斯坦因致罗里默的信(包德利图书馆Stein MSS 38/18)

㉔ 关于温特小姐参见1910年3月16日斯坦因致罗里默的信(包德利图书馆Stein MSS 38/18);关于古德查特先生见1910年4月13日斯坦因致安德鲁斯的信(包德利图书馆Stein MSS 39/26);关于小约翰先生(Littlejohn)见1913年2月18日安德鲁斯致斯坦因的信(包德利图书馆Stein MSS 41/56)

㉕ 关于朱利叶斯·凡·威斯纳教授和哈那塞克,见Stein,1907:pp.xiii,135,307,571,426;Stein,Serindia,1921:pp.xix,673.关于苏默维尔教授见斯坦因1911年3月17日致安德鲁斯的信(包德利图书馆Stein MSS 39/44)

㉖ Stein,Serindia,1921: p.902,n.2

鲁斯宅内专门加盖了房间研究斯坦因此次收集品(壁画则另外收藏在拉合尔)^⑮。1919年12月,印度政府同意将文书部分送到伦敦进行研究。伦敦的印度事务部本应是合适的存放地,但那里缺少工作空间,所以它们可能又被转移到大英博物馆进行鉴定和编目^⑯。

1924年,为了给《亚洲腹地》图版卷准备图版,其他几组实物(包括纺织品)也从克什米尔运到了伦敦。安德鲁斯也因此回到了伦敦,并由琼·约书亚女士(Joan Joshua)协助进行此项工作。在依然是大英博物馆提供的工作环境里,他带领和指导了上百件古代织物样品的正确处理以及插图绘制工作^⑰。在《亚洲腹地》一书的绪论中斯坦因写道:

“从中亚最干燥地区沙漠和废墟中收集的许多极其脆弱的实物在以后完全不同的气候环境中保存,主要应归功于当时大英博物馆对它们尽力所做的专门处理”^⑱。

该书出版前,这批织物临时又移出了大英博物馆,所以,在1925年5月斯坦因写道:“在我的《亚洲腹地》中发表的这批古代织物现在还在班伯里(Banbury,靠近牛津)放在印刷制版者(亨利·斯通及其儿子, Henry Stone and Son)的手里”^㉒。

1932年6月,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收到了印度政府出借的斯坦因在阿斯塔那和楼兰的收集品中的部分纺织品^㉓,这批藏品原先存于大英博物馆的斯坦因藏品室。此外,的纺织品似乎都已送到印度,所以在1933年5月,另一批印度政府借给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的纺织品(来自阿斯塔那、哈刺和卓和高昌古城)是从印度送到伦敦的^㉔。

4. 谁在整理、修复和研究第二次探险收集的敦煌织物?

安德鲁斯和罗里默小姐是在斯坦因藏品室负责整理斯坦因第二次探险收集品的两个关键人物。整理斯坦因的藏品只是安德鲁斯的兼职,他的专职身份首先是伦敦的巴特西理工大学(Battersea Polytechnic)艺术系主任,后来又任克什米尔工业美术学院主任,而罗里默小姐则是全职的工作人员。他们经常和博物馆正式藏品部分的工作人员以及博物馆以外的其他专家接触。

对于纺织品,他们除登录“卡片”(以记录织物详细信息为《西域考古图记》^㉕一书词条的编写做准备)外,还负责其保护工作,包括寻找合适的丝织物做衬底和用合适的染料进行染色^㉖。在这些方面,他们也向博物馆工作人员请教,包括温特小姐(Miss Winter,织品修复)、顾德查特先生(Mr Goodchild,丝绸修复)和小约翰先生(Mr Littlejohn,书画修复)^㉗。在博物馆以外请教的专家中包括:维也纳研究波斯织物和中亚纸张的朱利叶斯·凡·威斯纳教授(Julius von Wiesner,1838-1916)及其学生T.F.哈那塞克博士(T.F. Hanousek),他们对各遗址出土的典型织物样本进行了显微镜分析,其分析结果可见《西域考古图记》一书中的描述性列表^㉘;此外,还有苏默维尔教授(Summerville)和J. 史特罗兹高夫斯基教授(J. Strzygowski,1862-1941)对来自伊朗织物的影响提出了建议^㉙,拉斐尔·贝特鲁其(Raphael Petrucci)在挑选实物作《西域考古图记》的插图方面也给予了帮助^㉚。安德鲁斯、罗里默和斯坦因负责寻找和敦煌纺织品有关的出版资料。这些资料包括:尤吉尼·